

【社会学研究】

双重边缘化中的人际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刘 婷,白淑英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如今,以QQ、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普及,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交生活方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同样如此。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则会发现社交媒体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复愈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时期与血缘群体断裂的情感支持;密切和地缘群体因时空而疏离的多重支持;维系和业缘群体因流动而不确定的信息支持;建构和趣缘群体在虚拟空间产生的认同支持。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和这些关系群体糅合为一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掌上新家、电子同伴、信息线人和秘密“后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双重边缘化;社会支持;人际支持;线上交往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3-0069-08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年龄在16岁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1]。随着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体,并将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49.7%^[2]。

学界提出“双重边缘化”概念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境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的经历,且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但受到个人技能、社会制度的制约,他们无法融入城镇,想退回农村,又缺少务农经验。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处于边缘,在城市中也处于边缘,即处于城市和乡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3]。

一些学者提出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状态的措施,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等,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4]。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

活境遇,解决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种双重边缘化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生活带来了何种影响;面对双重边缘化困境,他们是坐等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更多社会支持,以应对或缓解双重边缘化给他们的心理与生活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QQ、微信等社交媒体迅速普及,这一新的交流手段或许有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可能。因此,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的使用为切入点,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石,探究社交媒体在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境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情况

在对社会支持主体的研究中,Thoits认为,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都是给予个体社会支持的重要主体^[5]。Poel认为,社会支持的主体包括国家、社团和个人3个层次^[6]。贺寨平则把社会支持主体界定为更宽范围的“社会网络”,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7]。

对社会支持类型的划分则不尽相同。Wellman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5种^[8]。Coe等将社会支持分为归属感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和赞成性支持4种^[9]。Campbell等则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10]。

借鉴前人的社会支持理论,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心,分析他们在社交媒体中与家人、老乡、同事及趣缘群体的交往状况,重点探讨其在与不同关系群体的互动交往中所获得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社交支持和认同支持。

由此,笔者访谈了18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分别在2017年2月和11月进行。访谈对象均来自四川省,他们的父母多为老一代农民工,童年时期大多有过留守经历。

访谈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除了“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的身份认同困境外^{[1]63},在社会支持方面也呈现出双重边缘化特征——从乡土社会旧有关系群体中获得的支持不足,从城市社会新关系群体中也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而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则能获得或强化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复愈与血缘群体的情感支持,密切与地缘群体的多重支持,维系与业缘群体的工具性支持,构建与趣缘群体的认同支持。

三、掌上新家:断裂中复愈的情感支持

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在诸多血缘关系中,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李强认为,就社会中的个人所能获得的支持而言,“来自家庭成员的个人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方式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心理扶助作用是其他类型社会支持所无法替代和比拟的”^[11]。家庭成员共同生活、频繁沟通,因此往往能及时给予亲人以关怀、劝慰,为其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

访谈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面临被边缘化的状况:由于家庭

成员尤其是父母的长期缺席,亲人间本应融于日常生活的情感联系处于一种断裂状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最应该给他人提供情感支持的亲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与关怀。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童年留守经历相关。在18位受访者中,有16位受访者的父母在其童年时期常年外出打工,有2位受访者的父亲或母亲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绝大多数是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长大。可以说,他们务工前主要的情感支持来自隔代,父母在他们的记忆中如同过客。

“他们基本上就是过年回来一趟,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然后过年就不回来了,小时候我差不多都不会让他们抱我。(小时候)提到爸爸妈妈这个概念,我感觉就是有点血缘关系,但并不是亲密的亲人。”(受访者WM)^①

“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离开了屋里,然后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然后他们也是可能一年才回来一次,但是我当时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父母在外面,就觉得没啥子。然后跟他们联系的话主要是靠电话,他们打电话回来主要是跟我外公外婆聊聊,比如屋头有啥子事情了,他们外面的情况咋样,跟我打电话说的还是比较少,主要是让我在屋头里面好好学习,听话点,乖一点,多帮屋头里面做点活。”(受访者TJ)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走上了和父母类似的人生道路,需要互相依靠的城市生活就给彼此提供了改善关系的可能。社交媒体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平台。18位受访者中有15位受访者的父母在使用QQ、微信等社交媒体,并且有10位受访者一周至少和父母在社交媒体中互动3次以上,彼此之间用分享链接、建群发红包、朋友圈点赞等方式进行更加随意、更为深入的联系。

“我妈最近还让我帮她弄一个红包群,她特别喜欢发红包。然后她自己还会去弄那个啥子音乐相册,然后把我爸爸、我和我妹妹的照片弄在一起配上音乐……她自己经常在微信上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她就会转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就是喊我们快点去看,一天到晚在微信上面聊。”(受访者TJ)

使用社交媒体时的轻松感和便捷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交流更为顺利。受访者LD回忆,自己的母亲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平时“很凶”,但是她在微信的家人群里却爱发一些段子和搞笑的表情包,这使得一家人沟通的氛围比平时轻松许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也有助于弥合两代人的情感裂痕。

“我爸爸妈妈原先就不要我玩手机嘛,很不理解我玩手机,害怕影响学习,觉得会上瘾。但是现在我教会他们玩了嘛,玩得比我还起劲,特别是天天缠着我给她发表情包,现在我们有个娱乐就是天天在家里面的群里面发红包和表情包。”(受访者CHX)

除了和爸爸妈妈进行沟通外,和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的联系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上寻求情感支持的一部分。受访者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养育长大,他们对这代人的感情普遍深厚,甚至超过了与父母间的感情。如WM已经去云南帮父母照顾生意两年多了,但她还是非常想念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他们辛辛苦苦从一岁把我养到那么大,我说出去就出去了,家里

① 本文受访者姓名均以其姓名拼音的首字母代替。

都没大人照顾,就一个妹妹,特别是在外面受委屈了就更想他们了。”WM差不多两三天就会和爷爷奶奶微信视频一次,“能够看到他们现在咋样,就稍微放心点”。

但在联络感情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与爷爷奶奶的沟通中也存在刻意寻找或回避话题的现象,这与代际差异和城乡隔阂有关。受访者TH从小也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但是她表示有时跟他们聊天不知道说什么,“年纪大了,本来就有好多东西不晓得咋子跟他们说,而且城里面好多东西跟他们说了也不懂,还不如不说”。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与血缘群体的人际交往呈现出一种断裂中有维系、亲近中有隔阂的状态。由于父辈一方长期缺席,新生代农民工得到的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较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由乡入城,城市中互相依靠的共处生活或多或少填补了他们童年的情感空缺,社交媒体作为普遍使用的媒介工具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传递情感的纽带。然而,由于童年时期父母缺席、代际差异、城乡隔阂等原因,社交媒体对情感支持的作用还是有限。

四、电子同伴:疏离中密切的多重支持

在乡土社会中,地缘是仅次于血缘的关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认同并不如他们的父辈强烈,但地缘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外出务工使得这种地缘关系^①面临地域的阻隔,因为几乎没有人留在农村老家,适龄青年大多都奔赴全国各地打工去了。正在老家带孩子的TCM描述道:“家里面年龄差不多的都不多了,周围几家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还有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跑得比较远,去外面挣钱去了。”

还有另外11位受访者也反映了地缘群体的流散现象。在这种流散中,原有的社会支持也在弱化。受访者LJA认为,由于大家现在工作环境不一样,平时也缺乏联系,关系自然就淡了。

随着QQ、微信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地缘群体间开始较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交流,甚至还成立了同乡群、校友群以巩固地缘关系。在外务工8年的ZYY就陈述了这一现象:“刚开始出来那会儿(2009年)和他们经常打电话,但是后来慢慢就不咋子打嘛,大家各有各的事情也不方便,慢慢也聊不拢了。但是在网上遇到了,看到他们也在线,偶尔还是会聊哈,问他们在哪里上班,现在咋样。”尽管在一些受访者看来,这种联络是因人而异的,但社交媒体的出现的确便利了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在这种沟通中,部分地缘群体为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社交支持、认同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社会支持。

受访者LD高考落榜后离家外出,现在在云南帮卖小炒的父母打杂。除了父母和周围几个门面的老乡外,她在那边基本没有熟人。只要闲下来,LD就会玩手机,和老家几个要好的初中、高中同学用QQ聊天,甚至每天趁同学有空的时候专门给她们打电话,“主要是在这边不习惯,也想她们嘛,就跟她们讲讲心里话,摆龙门阵,跟她们一起比较好耍”。

Procidano等的研究显示,由青少年到成年,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同龄人而不是父母寻求情感支持^[12]。8位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地缘群体的同龄朋友最多,也往往能够给予

① 本研究中,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地域认同,地缘群体以乡为区隔进行划分。

自己更为贴心的关怀,而线上沟通较为方便、省钱,因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会选择利用社交媒体向地缘群体寻求情感支持。

除了向地缘群体中较为亲密的伙伴寻求情感支持外,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上还会向更多同乡寻求认同支持和社交支持。借助手机等媒体,昔日的同学、邻居也成了在异乡的电子同伴。受访者 WM 道出了日常喜欢跟同乡网上聊天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地方的人嘛,而且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想看看她现在在干些什么,走了啥子路,这样可以看一下自己走的路有没有问题,以后也可以参考一下。”WM 还喜欢在闲暇时群发消息给自己的同学、朋友,然后看谁先回复,再用这种方式和他开启一段聊天。谈到这点她有些不好意思,“在外面太无聊了嘛,想找人说话,感觉同学比较可能回复你”。

此外,同乡也成为信息与机遇的来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工具性支持。受访者 LJA 就谈到了在用 QQ 聊天时老乡带给他的帮助,“比如 YCH(初中同学)一起去广州找工作,之前我们(QQ)聊天他说想换工作,我也想过去,他原先就在那边打工嘛,就比较熟一点,还给我介绍了两个工作”。

总之,地缘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中较为亲近的一种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工作条件、信息获取等方面不如一般城市工作者,因此同乡在他们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地位更高。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多媒体性,使得地缘群体能够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多种社会支持。

五、信息线人:流动中维系的工具性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既需要维持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的旧有关系,也需要在城市生活中不断发展新关系,业缘关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业缘关系更倾向于提供实际的工具性支持,比如工作信息分享等,社交媒体在维系这类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初到城市时,父母是带领他们安家落户的领路人,那么之后结识的业缘关系群体,则可能为他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有 5 位受访者都存在类似经历,因为某些业缘关系,其融入城市的程度和工作状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受访者 TH 16 岁初中毕业就去佛山市打工,一开始是进厂,后来觉得流水线工作太过压抑,就辞职去超市工作,并认识了附近手机专柜的促销小哥。在小哥的介绍下,她做起了手机销售,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经历:第一次学会使用微信,第一次单独租房,第一次领到了 4 000 元一月的“高薪”。她至今都对遇到的同事心存感激:“现在都感觉很感谢我第一份销售公司,感觉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幸运,跟同事学到了很多,现在都不后悔一个人去了那个地方。”

但业缘群体的这种工具性支持并不稳定,曾在广东一家雨衣厂工作的 LX 认为,“同事之间平时上上班、耍一耍就可以了,不用太当真……明年又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同事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近年来愈发明显,农民工的工作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13]。因此,业缘关系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城市生活与工作中的工具性支持,同时这种支持也受到人员流动的影响。

QQ、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存在使得这种工具性支持在流动中更易被维系。受访者 LJA 自 2010

年初中毕业外出打工至今已换了9份工作,对此他说:“过年回去就想顺便换份工作嘛,有的工作干了几个月就想换。”换了工作之后,也会留下同事的QQ,虽然平时很少联系,但逢年过节还是会群发一下祝福语,“主要是想保持一下联系嘛,想跳槽了也可以问一下他们那边工作咋子样了,问一下他们就不用自己白跑一趟”。另外一位受访者TH现在的工作就是因业缘群体而获得的,“我就看到朋友圈里面之前的同事,他在发那个vivo招人的信息,差不多是管一个片区的嘛,是去负责培训啊、考察之类的,然后我就面试去了”。

早在1973年,格兰诺维特就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认为弱连接在提供可能的机会时,是更加重要的资源^{[14]84}。尽管在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旅游式打工”中,同事关系成为一种不确定、流动的弱关系,但它拥有比“强关系”更高效的传播效率和更广泛的传播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和作为“弱关系”的业缘群体联系时,QQ、微信等社交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TJ对此深有感受,在与不熟悉的人沟通时,社交媒体的亲和感和延迟性能够促进彼此间的有效交流,“相比于打电话而言,(QQ)就更加随和一点,你打电话的话就别人问一句,你就必须回答一句,其实有些问题别人问你,你自己考虑一下,再回答是更好的,所以电话感觉更严肃。因为有些换别人回答你,你不好好想清楚,你再回答怕得罪别人。你这次来找我帮忙,如果是电话,我听不懂你让我帮啥子忙,我可能就直接会不同意。但是我在QQ上我们就可以慢慢地问,也可以想好咋子回答我”。

总之,血缘关系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下来,但要超越父母一辈的发展路径,业缘关系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而言,由于其工作的流动性较强,他们和业缘群体彼此间的工具性支持和社交支持很难促成亲密关系的形成。社交媒体凭借其交流的亲和感和延迟性,成为维持这种没有过多感情成分的工具性支持的适用手段。

六、秘密“后台”:虚拟中构建的认同支持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中交往的另一类独特群体——趣缘群体。所谓“趣缘群体”就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集合起来的一群人。趣缘群体从古至今都存在,但一般在城市中较多,乡土社会的有闲时间较少,所以趣缘群体较少存在。

蔡骥指出:“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的更新换代,现实社会中零散而小众的趣缘群体如今正在网络虚拟社区中蓬勃生长。”^[15]我们的3位受访者也加入了以社交媒体为依托形成的虚拟趣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专门的趣缘关系群体,自然无法得到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结识趣缘群体的可能,使得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支持。

受访者TC今年21岁,他从初中起就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最喜欢“英雄联盟”。时间一久,许多游戏中经常组队的战友也彼此交换QQ,以便辅助配合作战。TC描述道:“我们可以在QQ上面一起开语音打(游戏)配合。还有一个聊天的群啊,可以一起聊一聊这个事情,聊这个英雄联盟的技巧嘛,其他事情很少聊,就是很纯粹的网友,假如你哪天不玩那个游戏了,可能就淡了吧。”

因为游戏走到了一起,又因为游戏有了维系关系的共同话题,TC所加入的游戏迷群体本身就是一个趣缘群体。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就是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认同,而彼此之间通过

社交媒体交流的内容,也在传达或者确认这样一种认同,形成了某种心理支持——认同支持。但这种支持作用如何,还是因人而异。

另一位受访者 LD 从高一开始追星,疯狂迷恋韩国组合 EXO,为了帮助偶像做更多的事情,LD 在 QQ 上加入了好几个相关粉丝群,其中一个为专辑代购群,另一个为打榜群。据 LD 描述,粉丝们在群内都很活跃,“我们都是很迷 EXO 嘛,每次出了新专辑的时候,大家相互一起买新专辑,统计名单,专门从韩国找人代购。另外,我还加了打榜群,里面差不多好几百个人,组织得也比较好,分为注册组和投票组,主要是新专辑、新单曲出来的时候,大家每天帮着偶像各种打榜,好多时候手机、pad、电脑都开起来弄,也会怂恿自己的亲戚啊或者同学来投”。

受访者 LD 借助社交媒体活跃于虚拟社群之中,展示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畅快表现的真实面。她之所以投入到这个群体,也和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被身边人理解的一面能够在这里得到认同有关。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将日常生活看作舞台表演的前台与后台。他认为,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在前台,人们所呈现的形象往往受制于社会规范。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掩饰前台不能呈现的事物、为前台正式表演做准备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16]22}。受访者 LD 遵守社会主流秩序和交往规则的现实生活则是前台,而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暂时展现某一方面天性的虚拟社区则可以被视为后台。社交媒体本身的隐私性给这一后台平添了某种不可言喻的魅力。尽管互动的网络平台是虚拟的,但支撑这一群体存在的认同感却是客观实在的。在面对虚拟空间的趣缘群体时,借助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和链接性,新生代农民工徜徉在不受现实拘束的秘密后台。

七、结语

从微观层面看,“双重边缘化”不仅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留不住城,返不了乡”的失落,还间接导致了其社会关系的疏离和孤立,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面对双重边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新生代农民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与强化各种社会支持,缓解了心理的紧张和生活上的压力。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虽有益于使用者获得、强化各种社会支持,但媒介只是一种镜像,支配其产生作用的是更加深邃的现实。和其他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独有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现实就是“留不住城,回不了乡”的双重边缘化状态。作为一种工具,社交媒体具有双重作用,使用者既可能利用这一通讯手段让自己的生活更为美好,同样也可能因此而逃避生活,或者放大人生的缺陷。在这个方面,本文受到研究框架和视野的限制,未来还有待更多研究去发掘。

参考文献:

- [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 工人日报,2010-6-21(1).
- [2] 国家统计局.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7-04-2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 [3] 于学江,王宝海. 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双重边缘化的对策[J]. 农业经济,2013(8):103-104.
- [4] 徐拯. 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困境及其对策探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21-124.
- [5] THOITS P A.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processes: where are we? What next? [J].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Behavior, 1995(1):53-79.
- [6] POEL M G M Van Der.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J]. Social Networks, 1993(1):49-70.
- [7] 贺寨平. 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1):79-85.
- [8] WELLMAN B, WORTLEY S.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ship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89(3):273-306.
- [9] COE R M, WOLINSKY F D, MILLER D K, et al.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use of physician services: a reexamination[J]. Research on Aging, 1984(2):243.
- [10] CAMPBELL K E, LEE B A. Sources of personal neighbor networks: social integration, need, or time? [J]. Social Forces, 1992(4):1077-1100.
- [11]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1):67-70.
- [12] PROCIDANO M E, HELLER K. Measure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rom family: three validation stud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3(1):1-24.
- [13] 李拯,程晨,顾春,等. 短工化渐成年轻人务工新趋势[N]. 人民日报,2012-02-20(9).
- [14] 马克·格兰诺维特.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5] 蔡骥.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9):5-23.
- [16]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范艳芹)

Interpersonal support in dual marginalization: on the social media u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U Ting, BAI Shu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Law,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social media such as QQ, WeChat that spread rapidly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focusing on the social media u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 can discover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social media: curing the emotional support with consanguine group that once broke in their childhood, linking multiple social supports with region group that is alienated for long period of separation, mai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with karmic group that's getting uncertain for mobility, establishing the identifying support with their interest-related group that's real in virtual space. In the process, the social media combines with these groups, and it has become the handhold home, electronic companion, information informer and secret backstage.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media; dual marginalization;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support; online communication